

李学勤 / 著

LIXUEQIN

走出 疑古时代

WALKING OUT OF THE "DOUBTING OF ANTIQUITY" ERA

自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口号以来，走出疑古已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书是作者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高质量学术著作。

本书1995年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等撰有书评，很多大学的历史、考古、哲学等院系把它作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为必读书目。1999年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長 春 出 版 社

K220.3
1

李学勤 / 著

LIXUEQIN

走出 疑古时代

WALKING OUT OF THE "DOUBTING OF ANTIQUITY" ERA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疑古时代/李学勤著.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445-0270-2

I. 走... II. 李... III. 文化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9749 号

走出疑古时代

著 者: 李学勤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王国擎
版式设计: 韩国栋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印 刷: 长春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本 787×1092 毫米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李学勤 男,1933年3月生于北京。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至2003年,到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简帛佚籍与学术史》(1994)、《走出疑古时代》(1994)、《重写学术史》(2001)、《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等多种。

出版说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图书出版界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出版物,其中有很多是文化精品。有许多学术著作,经过读者的广泛传告,吸引了一个庞大的阅读群体,成为当代的学术名著。因为它们或是中国老一辈学者的毕生心血,或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可恒久流传的图书。时间过去一二十年了,这些图书在市面上已经基本见不到了。在阅读愈益深刻的今天,修订出版一批这样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走出疑古时代》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作者李学勤先生,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自 1992 年李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口号以来,走出疑古已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书是作者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高质量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六篇,第一篇论古代文明,第二篇神秘的古玉,第三篇新近考古发现,第四篇中原以外的古文化,第五篇海外文物拾珍,第六篇续见新知。主要涉及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化、中原与边远地区的文化交流、早期的中外关系等主题。

本书 1995 年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等撰有书评,很多大学的历史、考古、哲学等系把它作为本科、研究生的教材,或列入必读书目。1999 年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本书原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社在此基础上,全面进行了修订,开本由原来的 32 开,变为 16 开。

我们希望该书的修订出版,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古代历史、学术史、思想史和考古学会大有裨益,它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长春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自序

《走出疑古时代》这本书,是我最近几年继续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果。

我自知研究能力有限,所及范围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前段,即自文明起源到汉代初年。中国文明的这一段十分宏大辉煌,对我来说如同眺望海洋,竭尽目力也难见其边际。这几年事务繁多,能接触到的不过几个课题,因此我便把本书划为六篇:

第一篇是关于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的发展。中国文明的始源,二三十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心的题目,争论很多。篇中第一节《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综合了我一系列小文的观点,勾画了有关看法的轮廓。书里还有几节和这个题目有关,如第二篇第二、第三两节论良渚文化符号,就涉及文字的起源。

古玉的研究,近年随考古发现的增加而有迅速进展。玉器在中国古代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不久将与青铜器研究并驾齐驱。我做的一点工作,多数是关于早期玉器的,现划为第二篇。

最新考古发现多对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有重大价值,我以能力所及,有选择地做了一些考察。本书第三篇中谈到的,如濮阳西水坡墓与天文的四象、北京琉璃河金文与周初封燕、三门峡上村岭墓与虢国史事等,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

对中原地区以外的考古发现,第四篇各节用了较多力量去探讨。尤其是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两项重要发现,事实上已经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我觉得有必要从多种层面和角度讨论研究。

观察和研究海外发现或收藏的中国文物,也是我经常的工作之一。本书第五篇各节所论,有的是流散到外国的中国珍品,有的是境外出土的中国文物,或者与中国文化有关可资比较的文物。

在本书各篇节中,我着重谈几个问题,记在这里,以供读者参考:

一、上古时期的宇宙论(cosmology)。中国汉以前对宇宙的认识,有其明显的特征,富于哲学和科学史的意义。当时一些观念渊源久远,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时期。本书第二篇第二节《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第三篇第一节《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等,均与之有关。前者曾以 A Neolithic Jade Plague and Ancient Chinese Cosmology 为题,在 1992 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报告过。

二、饕餮纹的演变。所谓饕餮纹,在中国考古学、美术史、神话学等学科中,都有重要的位置,但其性质和源流迄今不很清楚。本书几处对此试作研讨,如第二篇第一节《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主旨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珀西沃大卫基金会召开的“商代青铜器纹饰的意义”讨论会上提出。另外第三篇第二节、第四篇第七节等,也有涉这一问题。

三、中原与边远地区文化的交流。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共同缔造的。我一直主张古代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的文化间存在着双向的传播影响。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到很遥远的地区,同时在中原也能找到源于边远地区的许多文化因素。书中较多篇节谈到这个看法,而以第四篇更集中些。

四、早期的中外关系。本书第五篇论介了日本、韩国、阿富汗发现的若干文物,皆与当时中外的文化交往有关。比如日本、阿富汗出土的铜镜,可补充 1991 年出版的拙著《比较考古学随笔》的一些论述。日前我写了一篇小文,根据最新公布的材料,谈及商朝通向东南亚的道路,似可与“西南丝绸之路”相证,可惜其内容已不及纳入本书了。比较考古学方面的试探,我很想继续下去。

这里还应谈一下本书的标题。两年以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整理后冠以此题,现在已用作本书导论。从这个标题委实容易联想到冯友兰先生(上世纪)30年代关于“信古、疑古、释古”的提法,我在导论中也确实引述了冯先生的话。

冯友兰先生这一见解见于《古史辨》第六册序,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信古、疑古、释古,指的是怎样看待文献记载的古代历史文化的问题。疑

古是晚清今文经学一派率先倡导的一种思潮,反对古人对文献一味尊信,要求就古史普遍作理性的审查。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因怀疑过度,难免造成古史的空白。这一思潮的影响深远,要对古代历史文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不摆脱有关观点的约束。冯先生提出以释古代替疑古,确具卓识。如我在导论所说,有人建议把释古改为考古,考古是释古的关键方面,不过释古的涵义比考古要更为广泛。

我常常揣想,冯友兰先生的提法应该和他任教多年的清华大学学风有关。大家知道,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导师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讲师为李济。那时,梁任公在清华执教有年,他以往曾认同“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但他这时的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议论已较持平。王国维先生对古文等问题作了许多切实研究,并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上、地下材料彼此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更是中国人自行主持考古发掘之始。清华不少学者对古代的探究,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为释古之说开了先路。

信古、疑古、释古的提法,已经是学术史上的公案了。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和文献学,都是相当发达成熟的学科。充分沟通这些学科的成果,将能进一步阐释古代的历史文化。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理解、比较和估价,从而作出具有理论高度的贡献。这是我长期企望的目标,却苦于力所未及。放在您们面前的这本小书,只能算是近期工作的一份报告,个中得失,敬请评判指教。

对辽宁大学出版社热心关切学术发展的精神,我深为钦佩和感谢。

作者

1994年5月26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寓所

目 录

出版说明	1
自序	1
导论 走出疑古时代	1
一 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1
二 两种考古证据	2
三 学术史的再认识	4
四 古书新证(甲骨金文)	6
五 古书新证(简牍帛书)	7
六 结语:走出疑古时代	10
第一篇 论古代文明	11
一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11
二 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	23
三 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	28
四 商代史和甲骨学研究展望	33
五 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	36
六 天下之中	42
七 关于《周易》的几个问题	43
八 西方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趋向	47
第二篇 神秘的古玉	53
一 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	53
二 论良渚文化玉器符号	60
三 吉斯拉玉琮的神秘	65
四 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	69
五 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及有关问题	76
六 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	82
第三篇 新近考古发现	86
一 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	86
二 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	90

三	商末周初的多穿戈	92
四	克罍克盃的几个问题	96
五	再谈洪洞坊堆村有字卜骨	98
六	邢台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	101
七	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	103
八	三门峡虢墓新发现和虢国史	108
九	益门村金、玉器纹饰研究	110
第四篇	中原以外的古文化	115
一	多彩的古代地区文化	115
二	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	119
三	三星堆与蜀国古史传说	123
四	《帝系》传说与蜀文化	130
五	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	135
六	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	138
七	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	141
八	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	145
九	丰富多彩的吴文化	153
十	宜侯矢簋的人与地	158
十一	安徽南部的青铜文化	160
十二	论擂鼓墩尊盘的性质	164
第五篇	海外文物拾珍	167
一	针刻纹三角援戈及其他	167
二	鲜簋的初步研究	172
三	楚王禽审盥及有关问题	174
四	古镜因缘	177
五	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	180
六	韩国金海出土的西汉铜鼎	182
七	力、耒和踏锄	183
八	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古文孝经》论介	186
第六篇	续见新知	191
一	良渚文化与文明界说	191
二	商周青铜器与文化圈	192

三	论洋县范坝铜牙璋等问题	198
四	重论夷方	200
五	秦封泥与秦印	203
六	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	206
七	城固两罍铭文的研究	210
八	关于鹿邑太清宫大墓墓主的推测	212
九	释楚帛书中的女娲	213
十	关于绵阳双包山汉墓墓主的推测	215
十一	谈“信古、疑古、释古”	217
十二	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明	222
附录	本书所收论文出处	224
	1994 年版后记	227
	1997 年修订本跋	228
	新版书后	230

导 论 走出疑古时代

——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一 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 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二 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我特别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1992年第4期发表,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最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沔西挖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间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最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聂崇义的《三礼图》,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

一些图传下来的。它把器物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背上背着个尊。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实际不是这样,没有动物身上背个尊的。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最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完全是这个样子,可见《三礼图》虽然画的不一定都对,但是并非毫无所据。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

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考古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上世纪)20年代,他写了《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哪儿吗?先见于《清华周刊》,后来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学》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他和秉志、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科学画报》,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潞容编辑。说起这两个人,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学来的。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科学》杂志上,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本,现在是珍本了。

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新发现至少不比那个时候少吧?可是有一点,重要性差些,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尚书》。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

现在的发现还没有《尚书》,可是至少从数量上说,比起古代一点不差,因此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屡屡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直接看到当时的书。我自己认为,对这些东西做全面和彻底的研究,恐怕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得到的。因为比如汲冢竹书,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研究,对古史研究作用很大。所以这一类新发现,它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古书的面貌和我们的想象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有时候我常常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孔安国,或者束皙、荀勖这些人的重大成果。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来。当然他在某些点上比我们认识得更多,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已不认识繁体字。繁体字离开我们才多少年?社会上繁体字还存在,可当时社会上已没有古文流行,

人们没有这种教养。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古书是一种新的信息途径。它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学术，这个机会是前人没有的，因为至少两千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过去很多东西都糟蹋了，像王僧虔所见的所谓蝌蚪文《考工记》，结果根本没有传下来。还有傅奕本的《老子》提到，在徐州发现了项羽妾墓，墓里面发现了《老子》，可是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只是做了一点儿校勘，也不知道哪些是从项羽妾墓来的，是不是就是《汗简》里的《古老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把新发现的这些书整理出来，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至于说，我们学术界要想充分吸取这些东西，得到它的影响，那还仅仅是尝试。当然，今天它已经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在现已发现的这类材料里，我想今天大家最需要的有一种就是秦律和汉律。过去研究汉律，比如沈家本、程树德专门辑录汉律，他们钩稽汉律费了那么大劲，至于秦律简直不成条，所以程氏的书只叫《九朝律考》，不敢叫《十朝律考》。近年我们居然在云梦睡虎地和龙岗两次发现了秦律。秦律我们发表得还比较快。现在江陵张家山两批汉律竹简还没有发表，但可以告诉你们，材料好极了。我老劝人不要急于去讨论什么“隶臣妾”，最好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材料太多了，如果你说错了的话，马上没法办。张家山简数量很大，第一批和云梦睡虎地的简差不多，总在1200枚左右。睡虎地随葬秦律的那个叫喜的人是个令史，他抄的那些律，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随葬张家山第一批汉律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官职比睡虎地的官要高，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这批简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盗》、《贼》二律，它的细致程度比起唐律并不逊色。它考虑的各种细节，比如杀人吧，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对象以及亲属关系等等，非常非常细。从这一点看，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不是很多。

另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是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特别是《易传》。关于《易传》，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易传》中的《易之义》比今本《系辞下》多出很大的一段，而这一段和今本《系辞》有同样的哲学意义，这当然极其不得了。

当然除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现，比如定县八角廊的西汉竹简《论语》，估计还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另外还有《周易》，那是阜阳八角廊汉墓出的，是占卦用的，像《火珠林》这类玩意儿。

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发现这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绝大多数是佚书，即使是今天还有传本的，也很不一样。比如马王堆帛书《老子》怎么会把《德经》放到《道经》前面？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台湾一些学者的那个意见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就是抄写时把上下篇给拿错了。当时是抄写上的错误，造成了一种暂时流行的本子。这我自己是不接受，但还是可以考虑。

三 学术史的再认识

以上所说，引起种种的问题。我认为，今天它对我们学术史研究的影响还不仅仅是

这些发现的东西本身。我们看见《周易》经传这些东西，当然对研究《周易》有很大好处。我们看到《老子》，对研究老子很有用；看到《孙子》，对研究孙子很有用。但我以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出土的东西所显示的当时的学术面貌。这种面貌和我们过去的估计相当不一样，这件事是个大问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有一个改观的必要。

当然如何评价这个影响，今天我们还做不到。虽然我比在座的几位痴长几岁，但就连各位也不可能完全看到其结果。因为发现太多了，不断出现，必须深入研究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其成果。可是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它是特别重要。今天已经可以认识到，过去我们的一些结论，受过去出现的思潮影响认识到的学术史的面貌，现在看起来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们的思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深受影响的疑古思潮，下面我说说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你们大概都看过我在《人文杂志》增刊上的一篇文章。这里我得做点儿说明。从小我就读过《古史辨》，小时候我有一次走到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古史辨》第三册的上本，看过之后就着迷了，后来把整个《古史辨》都买来看。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

从晚清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是中国有，外国也存在，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在日本也成了名文。奇怪的是这篇东西在中国怎么没见过？我觉得现在应该翻译翻译了。西方如马伯乐，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而且也是比较早的。晚清以来的看法为什么在中国会造成这种影响？还可以向上追溯到清代的学术史。

我一直认为清儒的学术是做出了巨大成绩的，可是，它有一个极不好的地方，在今天还有影响，就是它很讲门户。当然这一点，实际上晚明也有，晚明就有人开始讲门户，可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大学者还是很博大。所谓“三大家”，甚至于像“四公子”这些人，不管他学什么，都是很博大。甚至一些较小的思想家，像江西的易堂九子，都很博大，还没有门户之见。但清朝自己的学术确立之后，特别讲门户，一点点讲，第一步是分汉、宋，首先就把宋学一脚给踢出去了。最初宋学的影响还是很大，像李光地这些人还是大受重视。可是后来汉学逐渐上升，汉、宋的门户就先分开来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就是证据。分了汉、宋之后，再分西汉、东汉，把今、古文分开了。然后在今、古文里还要分，越分越小，眼界越来越狭窄，看的书越来越少。这个分门户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辨伪。这个讲门户实在要不得。我觉得我们写学术史，一定不要这样。

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在对古书的辨伪上，晚清的疑古思潮反而是继承宋学。宋人